

中国历史 研究

第1辑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

书目文献出版社

87
K207
86
2:1

目次

论著

中国史学略论

华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关系

西周年代新考——论金文月相与西周王年

治史答问三则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史学二陈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古代史

东汉至西晋初期（西元二五——二八〇）

中国境内游牧民族的活动

宋人对胥吏管理的看法

近代史

梁任公与民国

现代史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选载）

——并述“五四运动”及其辞职复职情况

复兴社创建经过及其贡献

八年抗战史略

——中日二十二次大会战经过简表

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

长沙大火与张治中（遗作）

人物传记

明末孤忠朱舜水的一生

连雅堂先生的生平

板桥林家花园的上代人

国父孙中山先生与宗教的关系

七七抗战中的宋哲元

补白

康有为与我的祖父

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的记录已发现

钱穆 一

秦孝仪 三〇

周法高 三五

严耕望

六七

七二

七五

金发根 七八

刘子健 九〇

王 泳 一〇四

蔡元培 一一〇

邓文仪 一一七

《艺文志》资料室 一二二

张发奎 一二六

潘公展 一三〇

郭 垣 一三三

《艺文志》资料室 一三八

唐 风 一四一

一一六

云 汉 一二九

七七

《中华杂志》编辑部译 八九

BZ26/25

B 378603



中國史學略論

錢 穆

壹

中國思想之偉大處，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觀。如言死生、存亡、成敗、得失、利害、禍福、是非、曲直，莫不兼舉正反兩端，合爲一體。其大者則如言天地、動靜、陰陽、終始，皆是。

今言前後。空間有前後，時間亦有前後。依空間言，眼前面前謂之前，一切行動必向前。靈須向後，則須轉身，仍向前。但時間則過去謂之前，未來謂之後。人之一生，自幼到老，乃從未來向過去，始謂之向前。今謂人自幼童向青年，向中年，老年，則成爲從過去向未來，乃退後，非前進。成爲由生到死，過一日則少一日，漸近死，漸離生，豈不成爲人生之倒轉。人生貴有積有成。生日積，則幼童成爲青年，又由青年積成爲中年老年，此之謂壽謂福。人生須多壽多福，待其死則此生已畢，非爲由生進到死，乃爲其生已盡，變而爲死。但生是生，死是死，正反可合，不得相混。在我之前，早已有生。父母即我之前身。由父母生我，我乃父母之新生，父母乃我之舊生。亦可謂父母乃我之前身，我乃父母之後生。使無父母之前之舊，又何來有我之後之新。新舊有如前後，亦正反相合。

中國乃一宗法社會，身生命之上向有家生命。我生以前，有父母祖宗。我生以後，有子孫傳世。而重舊尤過於重新。家則必稱舊家，人則必尊老人。人能老，家能舊，中國人則謂之福。

由人生之積而舊而有成，乃有史。一人有一人之史，一家有一家之史，一國乃有一國之史。以孔子爲例，孔子一人有其史，其家亦有史。自孔子迄今，已傳七十餘世。自孔子以前，尚可推溯以至於兩祖契，當亦有數十世。則孔子一家已歷四千年以上。其實中國每一人每一家皆然，惟孔子可供作標準之一例。而中國亦已歷五千年而長存。

然則人生向前，乃向古老往舊之前，而日積月成。此後未來，胥當向此過去而前進。近人言歷史不可變，人生則胥向此

不可變之史而前進，即向此已成之局而前進。在其過程中，則不斷有新的發現。祖宗乃其一家之舊，子孫則其一家之新。一切新則皆向此舊而前進。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儼無新，則其舊失去，不得仍爲舊。惟中國乃爲舉世其他民族中一舊，歷世已五千年以上，即讀一部中國史，例證顯然矣。

今人乃謂歷史乃由舊向新，實則新在後，舊在前，歷史與人生皆當向前，不當向後。若向後，則成倒退，烏得謂之前進。今惟當由未來向前過去，不當由過去倒向未來。因過去在前，已顯已知，已有定有成，乃有意義與價值。未來則尚隱不知，無定無成，乃無意義價值可言。今一世則羣求鄙棄此已見已知有定有成之有意義與價值者，轉身倒向於尚隱不知無定無成無意義與價值之一途而邁進，遂使此世界落實到今日不知明日之悲局，是誠大可浩歎矣。

人之求知，亦惟知其過去之舊，不能知其未來之新。中國史學言鑒古知今，凡其所知於今後者，亦本於其知於前者，而推以爲知。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苟於其前古一切不信不好，則自我創造亦惟無把握冒昧危險之一途而止。他又何言。

故求深切體會中國民族精神與其文化傳統，非治中國史學無以悟入。若如宗教哲學文學科學其他諸端，皆無堪相伯仲，相比擬。

今再以當前淺近處具體言之。今日人生已成爲一機械之人生，如電燈自來水種種日常生活，皆賴機械。電腦尤然。非賴機械，人生將無以度日。現在世如此，未來世益當然。百年前馬克斯已唱爲唯物史觀，此下唯物當轉爲唯機械。如太空飛行，近人乃謂當以征服太空。其實所能征服者，僅地球附近四圍之太空。實亦未能眞征服。此外尚有太陽系之太空，尚有不知幾千萬倍以上之整個自然體之太空，豈當前機械所能征服。當前機械之眞所征服者，實乃當前之人生，亦即當前之人心。而人心終有所不甘。人心儼肯甘受機械征服，則核武器之發展當使人類不再有戰爭。今則一反其道，戰爭危機更逼前來。今人乃謂乃未來世向現在世挑戰，實則仍是現在世在領導未來世。而舉世人心於此終不悟，此因人心已受機械之奴役，人心亦已機械化，而不能再自主。則世界末日，乃機械征服人類。人類消滅，機械庶亦告終。莊周言：「薪盡於爲火，薪盡而火傳。」但薪之爲火，亦一自然。而人心之創爲機械，則實非如自然之薪。故中國道家乃並求廢枯樸謂其啓機心。機心起，則機械

自顧而至矣。

馬克斯分當前人類爲有產無產兩階級。實則人生不能無產。惟當前人類則憑機械爲產，無產階級亦分得此機械。如當前蘇維埃之擁有更多核子武器，則所謂共產，豈不爲人類更大之災禍。此則馬克斯所不知。就當前論，不僅核武器當廢，電腦之類亦當廢，電燈自來水之類可不廢，但當改良其用途，不當求無限之發展。當追隨於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不當違反於人類之自然生活求發展。人類生產當求以農工爲本，不當以工商爲本。此則觀於中國西方之歷史發展而可知。

孔子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人類從自然，重自然，乃以舊人類求爲新人類。求能立，即立在此自然，即立在此過去與現在中，而始能領導其未來。勿使未來之新來干擾此過去現在之舊。先能立，始能不惑。立此舊，始能不惑於其他一切未來之新。則人類之新亦以完成此大自然之舊。此之謂「一天人，合內外」。則有因有革，雖百世而可知矣。

孔子又曰：「富貴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須求之於外與未來，所好則在己之一心之當前與過去。求之外與未來，中國人謂之欲。吾之所好，在己心，在當前，在過去，不求自得，中國人謂之性。機械皆從欲來，不從好來。人生能從過去世現在世以直達未來世者，此惟性，性則己之所好。因其性而有革，乃革其不可好者，非別有所求也。有所求而自違其性，自毀其善以求變，變而日新，乃終不見所好，此則人生之悲劇矣。此惟善讀人類已往歷史者，始能知之。西方人不重歷史，此則其大失。電腦核武器一切機械皆憑以有求，非即所好。中國人言立言達，立於所好，始能達其所好，亦惟從其所好而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是也。電腦核武器一切機械皆非人性所好，非可於此立。非所立，又何達。核子戰爭又豈人之所欲達。故現世所將達，乃無人能預言。

二、

中國人言，「人惟求舊，物惟求新」，人與物，大體乃有生無生人文與自然之分別所在。生命時間延續，新生命皆從舊生命中開發成長。物無生命，僅占空間，舊物已成，新物則待另製再造。故生命當富共通性，而無生物則當分別性。中國人重農，日與生命接觸，故中國人觀念亦富共通性，生發性。西方人重商，貨品多屬無生物，故其觀念乃多傾向分別性與創造性。

抑且物供人用，如電燈助人視，電話助人聽，電腦助人記憶，機器人助人操作，其用各不相通，故貴專。生命則一體之內各部相通，又貴與體外相通。中國人言，人為萬物之靈，靈即其通之尤者。故其於行為知識思想皆貴通。

語言通達人心，但各地方言可各不同，又難長時間綿延不變。西方有希臘語拉丁語，以及現代諸國語，既無共通性，亦無傳統性，亦如一物，日創日異，分別日增。其文字即代表其語言，西方文化正可據此推論。中國人則於語言之上更創文字，求其更相通，而更可久。而中國文字乃亦如有生命性。一部康熙字典所收字不到五萬，而日常通用字亦不到四千，或可更減至一千字，而適用全國已達三四千年之久。新增事物，皆可用舊字配合應用，不煩再造新字。如電燈電話電腦機器人等，一切新器物豈不只用幾個舊字即够。現世然，後世亦將仍然。中國之得為一廣土衆民大一統之民族國家，文字之用亦有其大貢獻。中庸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西方直到現代，僅於物上達到車同軌之一階段。書同文，行同倫，皆非其所

有。

中國文字應用，尤貴其在人之觀念相通上。如身家國天下四觀念，中國沿襲承用已達三千年之久。中國古人已知於國之上當有更高一層之搏合，即為天下。當時中國人知識尚不知一亞洲，更何論於五大洲。但此天下一觀念，至今仍可承用。西方人則於國之上並無一天下觀，至今仍僅有一國際觀。國與國之間有問題，何從得解決，當前舉世大亂即由此。

國與國之間，有共通事，有相互事，非列國分別所能解決。如唐虞時代之洪水為災，此乃列國共通事，乃共同朝向中央政府，積堯舜禹三帝之力而得解決。又如虞芮相互有爭，乃朝向於西伯昌即後世所稱之周文王以求解決，所謂「虞芮質厥成」是也。中國古代於列國諸侯之上有天子，其實天子亦如一諸侯，僅治其王畿之內之本國事。惟為其他諸侯所朝向，乃兼管天下事。惟此一同所朝向者，亦必歷時而變，故言朝代。唐虞夏商周，或禪讓，或征誅，有朝即有代。秦以下，中國全國僅一中央政府，但如漢唐皆稱代，故中國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惟有天下在其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顧亭林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也。此等觀念，又豈今西方人所有。

以現代國際形勢論，如舉世一百五六十國，果使共同朝向於美國，蘇維埃亦仍是一國，仍可處理其國內事。惟遇國際共通事，或相互有爭，則由美國為之平定。倘美國不勝任，舉世改朝向蘇俄，此則另是一代。但美國則仍是一國，仍得處理其

國內事。中國古代之封建政治乃如此。苟能爲現世慕效，豈不舉世可得和平。中國古人則稱之爲大同太平世。列國分治，則僅得有小康，不得有大同。故中國於治國之上又有平天下一大道。中國之行同倫，必達之於天下，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是矣。

春秋末，孔子墨子以下，中國士人盡不守國別觀，而均趨於天下觀。百家羣興，歷兩三百年而乃有秦代之統一。現代各國知識界，各抱國別觀，均無天下觀。苟使無如中國歷史上戰國一段之演變，則何能由中國唐虞三代之封建政治，走向中國秦漢以下之大一統制，乃可舉世有一最高中央來領導，此即中國人所謂平天下之大道，非今人之所能想望矣。

主要病徵，在舉世西化，重物而輕人，喜新而厭舊，不知以現在世來宰制未來世，而都求以未來世來改變現在世，本來顛倒，虛實混淆，人盡待之未來之虛，又於何處用力。抑且中國政治必尚禮，禮則本於人之性情，亦富生命性。西方政治必重法，法則必仗權力行使，本於外，非可歸之內，無生命性。故禮亦心，法亦物。故中國文化可謂之乃一種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稱人倫化，乃一種富於生命性之文化。西方則爲一種重物輕人之器物化，唯物化，進而爲機械化，無生命性。此則其大異處。詳研雙方史學而可知。

中國史學有所謂鑒古知今，亦即一般學問之所謂溫故而知新。朱子詩「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新知即從舊學來，此舊學新知之一貫相承，即自然科學亦不能例外。亦可謂學惟求舊，知惟求新。豈有廢棄舊學，乃能開創新知之理。故學必貴有舊傳統，而知乃始有新啓發，新舊自有其一貫融通處。惟自然科學重在物，史學人文學重在心。物則重在能分別，心則重在能會通。非通古人之心，焉能知古代之史。故稱萬物，亦稱一心。物稱萬，故曰物惟求新。心貴一，故曰人惟求舊。萬物各別，其會通處則在數學上。人事亦多變，其會通處則在人心之德性上。中國史學重人品觀，即人之德性觀，此乃其最精邃處。德性則只分高下，並不能分新舊，此一層當明辨。

貳

一、

歷史記載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人爲主，事爲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事之不完善，胥由人之不完善來

，惟事之不完善，須歷久始見。中國史學重人不重事，可貴乃在此。

事有外形同，而內情必不同。一人不能獨成爲一事，必集衆多人之情志以成，而其事乃更複雜。亦有單獨由一人與起主持其事，其他人乃無情無志而追隨，則其事之意義價值亦只在二三人。要之，事之重要性，常在少數人，不在多數人。中國歷史重人，尤重少數人。此乃中國史學一特色。

管仲相齊桓公，霸諸侯。桓公爲君，管仲爲之臣。然孔子則僅稱管仲曰：「微管仲，我其披髮左衽矣。」此爲中國史學精神，最值深研。如孔子開門授徒，弟子賢者三十許人，論語載其事。孔子之教各不同，諸弟子之學亦各不同，細讀論語而可知。孔子爲中國一大教育家，亦中國歷史上最大人物，而論語亦不啻爲中國一最有價值之史書。孔子之教，與西方古希臘蘇格拉底不同，知此，斯知中西人事不同，而主要則在人不同。今人稱孔子與蘇格拉底同爲一哲學家，斯失之矣。

中國正式第一大史學家，當首推漢代之司馬遷。其爲史記，乃自稱上學孔子之春秋。其中有深義，當加闡申。最重要者，乃爲其重人更重於事。其書自五帝三代起，春秋戰國，其往事僅撮其大要，不詳記載。如管晏列傳，有關齊國大事均略，而獨敘管晏二人遺聞軼事三數節，非以詳其事，乃以見其人。凡其人之事業，則胥從此等小節瑣事上樹立基礎。此正中國文化傳統大道精義之所在。孔子曰：「我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諸葛武侯言：「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任。」中國人認爲，細行能慎，能負天下之大任。馬遷此一篇管晏列傳，近似文學小品，實涵哲學大義。爲中國一史學家，又豈止於記載往事而已。

又如戰國時，遷書記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四公子故事，均不見於戰國策。而如孟嘗君門下之馮煥，信陵君門下之侯贏，平原君門下之毛遂，此皆三公子三千食客中所希選難得之傑出人才，然世人亦僅知有孟嘗、信陵、平原而已。自經遷書之詳載，乃知孟嘗信陵平原之得爲孟嘗、信陵、平原，其背後乃大有人在。此乃一番絕大提示，絕大指點。使處親貴之位，而欲有所作爲，當先知其所用心。而豈廣攬賓客，鑒其飲食羣居之所欲，而即能有所成就。

遷書所詳，乃在漢初開國以後。其先劉項相爭數年，軍事勝敗，寥寥幾行字即盡。然於項王沛公之爲人，性情隱微，則鉤劃如見其肺腑。而於兩人之部下，則敘述尤備。項王部下，僅添增一人而不能用。沛公部下，則有如張良、蕭何、韓信，

又其次如陳平、曹參、樊噲，更其次以至黥布、彭越、陸賈、叔孫通等，開國功臣，遷書詳著，不下二十人。其各人之性情才智行為功業，可謂備矣。當知漢祖開國，非漢祖一人之事，乃其一集團二三十人之事。至於開國之大業已成，分封功臣，不再詳載。西方晚近始有史書，僅只記事。中國史起源甚早，又必詳其事之成敗所由。其所由則盡在人。一事之成乃有不盡於一人者。並有無其事，而許其人，則猶見中國史學之深義。

即如秦始皇帝，其削平六國，統一天下，其事亦不在秦始皇帝一人，抑且亦不始於秦始皇帝之時，而尚遠在其前。細讀馬遷書亦可知。今人則誤謂秦祚始於秦皇一人，漢祚始於漢祖一人，則秦皇漢祖，宜可專制全國而有餘。此亦不細讀史書之誤。漢祖之得天下，一曰不嗜殺人，又一曰善用。而遷書之傳項王，則有三大事，一曰邯鄲之戰，一曰鴻門之宴，又一曰垓下之圍，以及烏江之自刎。項王爲人可愛處，實多於沛公。此又見中國史取人之宏，與其教人之深。而遷書此等處，遂成爲千古妙文。中國文學善於寫人，故一部良史，同時必是一部好文學。不通人生，則無以讀中國之文史。能通文史，始乃得爲中國之通人。秦漢以下中國之學，即謂之乃文史之學，亦無不可。而司馬遷之大功不可沒矣。

又秦末羣雄競起，論其事，則陳勝吳廣最先發難。然遷書未加重視，亦非以成敗論人。田橫身敗，流亡海上。應漢祖召，驛站自刎，在漢初開國史上可謂無影響。其隨亡者五百人，則更無姓名可考。秦末漢初之際，死者千千萬萬，遷書乃獨詳田橫及其賓客五百人，成爲千古文學嘉話。此下一部中國二十五史，類此者不絕。若果以今人之史學眼光加之衡量，則此等無關歷史大局之記載，豈不認爲頌文瑣節，湮充篇幅乎。

繼馬遷，有班固作漢書。斷代爲史，又中國史學一大進步。自古無不亡之王朝。後一代起，爲前一代作史，蓋棺論定，語無忌諱。而歷代新王，亦許其如此。是亦心知其子孫之不得永有其國矣，此亦中國史學一特有精神所在。班書有李廣蘇建傳，實爲李陵蘇武合傳，上承馬遷魏其武安等諸合傳來。同一時同一事，而參加之人不同，人與人之相比，是非高下，最易從此等處顯。李陵以八千步卒當匈奴五萬騎，可謂不世出之將才矣。蘇武北海牧羊，事若平易。孔門以回賜相比，又以賜商相比。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爲不能是。以事論，則海上牧羊與兩軍抗衡難易不能相比。以人論，則李陵之與蘇武，一相比而確見其爲兩人。中國史學偉大，亦正在此等處。

自唐杜佑作通典，於斷代史之外，又有通史。此又爲中國史學一大進步。通典爲書，即從馬班之書志來，取材相同，用意大別。朝代易，而制度相承，此亦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孔子言：「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又言三代因革，而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孔子此意，爲後代史學家所承襲。故治儒家言，必讀論語，又必讀馬班杜氏書。否則無以爲通儒，亦無以治史學。

南宋鄭樵繼杜佑作通志，擴大爲二十略。又爲中國史學一大進步。馬班之書重人，杜氏之書則重事，然亦非一般人之所謂事。至鄭樵，則不啻欲爲一部文化史，盡包一切人文而通之。然傳統重人不重事之見解，固猶保守無失，亦可謂大化之矣。清初顧炎武有日知錄，其書包容廣大，亦即史學。非寫史，乃論史，而亦寓有鄭樵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一書，亦足爲天下興亡負責。亦可謂馬班鄭之書，亦莫不爲天下興亡負責。能知此意，乃能知中國之史學。

施耐庵水滸傳，亦可謂師法馬遷。忠義堂一百零八位好漢，尤其是三十六天罡，性情各別，才智互異，而宋江獨不見有奇才異能之表現。其高踞忠義堂之首席，乃爲沛公型，非項王型。一百八人外，先之以王進一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亦遷書七十列傳以伯夷爲首之遺意。但就中國人傳統心情言，讀其書，雖亦情節動人，終嫌其事出虛構，不真實。中國人喜腳踏實地，在實情實節上下工夫，此即中庸之所謂誠，孟子之所謂有諸己之謂信。空議論，假故事，中國人向不重視。金聖歎力讀此書，與莊周屈原司馬遷杜甫之著作同稱爲才子書，然莊屈馬杜終不得僅目其人爲才子。水滸傳亦終不列入爲中國文學之正統。西廂記則僅兒女私情，不能與水滸忠義堂相比，更不待論。而聖歎之言，亦終不爲此下學人所共認。此乃有關民族性情大綱，自誠明，自明誠，主要先在一誠字。而誠又須合內外。耐庵此書，縱謂其亦誠於心，但不能誠於事，所以亦終成爲小說家言。

抑且耐庵此書，縱謂其能教亂世，但終亦不能教治世。傳之江湖山林，不能傳之廊廟官署。感於草莽，不能同感之於衣冠。其書成於元明之際，而明祚一統，其書終見不適。於是羅貫中即繼之有三國演義之問世。全本三國實事，然爲通俗，求取大眾愛好，則情節不得不有委曲。如曹操，兼擅政治、軍事、文學，爲一時代傑出人物。而廣攬人才，尤爲難能。其善待關羽，更可見。荀彧至晚年始離異。操之立意欲爲周文王，必待其子始受漢禪。但終諡爲武帝，其子丕乃諡文帝。即此小節，

可見中國亂世亦與其他民族之亂世有不同。故廣土衆民，得縣延五千年不絕。試讀曹操之述志令，此亦見吾民族之傳統性情，惟誠僞有辨而已。杜甫詩「將軍魏武之子孫」，則操之爲人，唐代猶見尊。司馬光資治通鑑，亦仍以正統歸之魏。朱子通鑑綱目，始有魏蜀正統之爭。然朱子書法，自謂乃慕效曹操，則操之爲人，卽就理學大儒言，亦尚不深嫉。三國演義出，曹操乃成一不足掛齒之亂世奸雄，一無是處，則又何以處曹操手下之羣才。諸葛亮一生謹慎，而演義中之諸葛，則綸巾羽扇，儼是神仙人物。其於魯肅周瑜，又盡失其眞。當時三國之所以得成爲三國者，演義書中皆失之。而關羽則以演義一書出，社會羣尊爲武聖，其地位尚在岳武穆之上。然論三國眞史迹，關羽不能遠諸葛東和吳北拒魏之外交大政方針，三國形勢起了大變動，此皆演義一書無當史實之大者。其實演義一書，亦承朱子爭魏蜀正統一意見來，與水滸傳同爲教忠教義之書，無失儒家大傳統。然中國人爲學，最貴在通。演義違背史實，亦終爲小說家言，宜亦不得列入文學之正統。

史學明與文學有別。然如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書，中國治文學者必所誦習。曾國藩繼姚鼐古文辭類纂後，編爲經史百家雜鈔，則中國經史百家，盡皆文學也。其爲聖哲畫像記，雖寥寥一短篇，然所列聖哲，則已盡包容了經史百家之學。而更要者，爲學必志於聖哲。曾國藩乃一文學家，其人則亦如曹操之政治軍事文學皆所兼擅。與諸葛亮王守仁亦相類似。而曹操爲人與此三人比，則判若天壤，絕不可以相提而並論。則中國史學之重人不重事，卽此亦見其大義之所在。

子貢曰：「君子恥居下流。桀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而衆惡皆歸之。」此非爲桀紂申冤，乃重其上下流之辨。流，猶今人之言趨嚮。曹操爲人，亦終易教人趨於下流，是以亦衆惡皆歸之。故中國人之爲人爲學，主要在辨其高下，辨其誠僞，辨其流，亦必明其統。如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讀者之心亦每易趨於下流，不易登入上流，故亦終不得爲文學之正統。

今人則據西方人意見，史學重事，文學則重在其能通俗大衆化，故小說戲劇乃成文學正統。而不知其弊。欲專意爲一文學家，則可盡摒經史百家於不顧，鄙聖哲而不爲。人之爲學，雖固爲己，亦當爲人，爲後世，而豈僅逞其一人情趣之所好。而又爭惟此乃始爲正統。不以事論，而以心論，心卽其爲人之主。中國人之爲人爲學，自亦有未可厚非之處矣。國人其以忠恕之道平心而思之。

然而中國史學，此下終當有所變。惟求變而當不失其大統。人才衆起，列傳一體勢難網羅，此一也。事態複雜，端緒繁

、曲折多，馬班之書與志，杜佑之通典，鄭樵之二十略，皆難詳盡，此二也。已無朝代之更迭，寫史何始何終，此三矣。是則中國舊史體例已不能守，如何成新史，此須有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者，創為新例，有如司馬遷其人者出。或有三數人出，分工合作，以共創此新體，而已非一人之力之所能為。此皆非當前之所能預知。然當會通羣學以創成為新史學，仍當重人，又當重其人之性情。則舊史學之大統所在，宜當善守之而弗失。此則仍當揭舉以為新史學之綱領與宗主，可無疑義。姑懸余言，企以望之。

二、

余曾謂歷史記載人事，而事必出於人，故中國史重人尤重於其事。一美國史學家當面質詢，果使其人不為歷史人物，則其事又豈得見於史。余答，此乃中西雙方歷史一大不同處。中國史籍中，更多非歷史人物，有超出於歷史人物之上者。此非細讀中國史，無以知之。

余姑舉一例，如近代平劇中有韓玉娘其人，乃載入明史及新元史，然實為一不知姓名之女性。近人造為平劇，乃姑以稱之為韓玉娘而已。此人之不得為歷史人物即可見。中國史學此一端，當值深論。

即如中國古史中之有巢氏燧人氏，其人姓名，乃從無知者。西方史學稱石器時代鐵器時代，誰始用石用鐵，則可不論。惟知其時代之為石器時代鐵器時代則已。中國人則不稱巢居時代火食時代，而必特舉一人以為此時代之創始，此即中國史學重人尤更重於事之一證。

中國人論人，則必分好壞善惡，即君子小人賢奸之辨。善人君子賢人固得見於史，而小人奸惡亦得入史。如夏商兩代，禹湯固必詳，而桀紂亦必及。其他帝王，或僅存其名，或並其名而不載。近代人重多數，其實一部美國史，開國以來兩百年，總統五十人皆有其名，其他姓字不詳者何啻億萬倍。是西方史學亦重少數，惟賢奸之辨，西方人似不以為意。

人分賢奸，斯事有褒貶。褒貶乃成中國史學之要綱。未有不分賢奸；不加褒貶之史學。史之褒貶，亦不始於孔子之作春秋。齊崔杼弑其君，齊史臣執筆直書，而見誅。其弟承襲史官位，又續書，又見誅。第三弟再續書，乃免。有史臣在野者，聞其事而來，則史筆已定矣。當時列國史官，由西周中央政府派任，其職世襲。周之東遷，天子聲威掃地已盡，而史官守職

；執筆直書，置身家死生於度外，有如齊史之所爲者。其實齊君亦非崔杼親殺，而終必正其名曰崔杼弑其君。此乃中國傳統史學精神，亦可名之曰中國傳統民族精神。然當時史臣之具此精神者，已不多見，故孔子作春秋而曰：「此天子之事也。孔子非任史職，乃因魯舊史作爲春秋，褒則褒，貶則貶，游夏不能贊一辭。此可謂由孔子之春秋而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矣。但此亦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一端，而豈孔子之自我創造乎。

今試捨春秋而讀左傳，此乃集合當時兩百四十年列國中不知姓名之作者所記載，而彙以成書。而其人物之賢奸，人事之褒貶，亦已至詳具備矣。孔子亦信而好之，承而述之而已。繼左傳又有國語，有戰國策，此等書皆不知出於誰何人之手，惟知其決不出於一人之手而已。然而所載人物無職無位，而賢奸褒貶，則既詳且備。其事則亦多無關於君國之大。此皆中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之隨時隨人而流露，爲並世其他民族所無有。近代國人讀之，則曰此乃封建社會事。如讀崔杼弑其君，則謂此乃專制政治下尊君觀念之表現。則試問何以在封建社會之上猶得有專制政治？近人必以西方史學來治中國史，則恐終難理解矣。

西漢司馬遷作爲史記，乃取法於孔子之春秋，其記事多采之左傳國語國策諸書，而有取捨，又有增益，茲不論。姑論其載楚漢之際，乃及西漢開國後事，則所略而不備者多矣，而乃特載田橫其人與其事。此亦特見中國之史學精神民族精神處。至於漢之立國，是非爲一帝國。漢之爲政，是否爲帝王專制。此皆可據遷書而論定。今人則必依據西方史學觀念與成語來加之中國史，則遷書亦可東高閣矣。

余於中國史學重人物，即多論列，然猶有不盡於是者，試再加申論。

中國人死，骨肉埋於土，立一木爲神主，期死者魂氣之常駐。祭之拜之，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木偶陪葬，孔子則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惡其薄生人以爲死人也。古埃及爲木乃伊，藏金字塔中，重得復生與否可不論，其屍其塔則歷千古而常在。希臘人雕石爲女形，藏之大建築中。建築雕刻長存，斯止矣。人生之安與其美則似轉不深求。中國之詩則曰：「窈窕淑女。」窈窕即安居，斯美矣。木在其體貌與宅第。此即中國重人西方重事之又一證。

戰國策蘇代告孟嘗君，有土偶人木偶人之喻。史記說苑皆載之。堆土爲人，無傷土質，雨淋仍爲土，亦仍得堆爲人。雕

木梗爲人，已傷木質，或遭打擊焚燒流蕩，此木梗將失所歸，亦將失其爲木梗。以歷史言，中國史如一土偶人，西洋史則如一木偶人。唐虞夏商周下及宋元明清，朝代興亡，中國則仍爲一中國，中國人亦仍爲一中國人。故中國歷史乃有其共同性。西洋史則惟見分別性，希臘各城邦，即各自分別。雅典人、斯巴達人即互不同。羅馬繼起，更有別於希臘人。現代國家興起，又更有異於羅馬人。尤如英法德意，大小各國，亦各相異。中國史同爲一塊泥土，西洋史則各別各成一條木梗。

中國人重在人羣中做人，再由人來做事。西洋人則在做事上來做人，在人羣中乃看重個人主義。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孝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學則學於人，教亦教於人。而所學所教，則即此人羣中相互共同所應有之忠信之德。老子亦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在人羣中做人，爲人與人，而仍能已愈有已愈多，亦即見羣己之一體。西洋人重事，而他人則爲之工具，爲之奴役，或爲之犧牲。工商業之發展，寧非如此。

即如宗教，教徒與教外人別，新舊教牧師與神父亦有別。政治嚴權位之別。社會嚴貧富之別。故西方有宗教戰爭，有民主革命，有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裂鬥爭。即如學術，科學哲學文學美學，事業分，人亦別。牛頓與康德遠相異，莎士比亞與貝多芬大不同，人爲事轉，乃不見有人類德性之大同。

至較近世，學術益分益細，而史學與政治學兩項乃終不占西方學術中之重要地位。政治家多從人事出，絕少從其專治政治學來。而史學則僅記往事，又若與當前實際人事無關。在中國學術界，則政學史學正爲一切學問中心主要兩項目。孔子卽爲其代表。中國人言學以成家，乃指其上有師承，下有傳人，如一家之相承。仍指其共通性，與西方之個人各業相別各成一專家大不同。故中國經史子集四部之學，乃可由一人兼而通之。如北宋歐陽修卽其例。經史則其學，子集則以教，而治平大道則爲其總目標。故中國學與西方異，人則亦異，而史亦異。欲治中國史，不通其人其學，則一堆往事尙何意義價值之有。

人從天來，今從古來，故司馬遷作爲史記乃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西方宗教科學哲學亦若爲求通天人，西方社會學法律學經濟學軍事學則亦若求通古今之變，但豈能囊括而無遺。故中國之史學乃爲集大成之學，而人爲之本。聖賢豪傑，亦卽集爲人之大成。

中國人重爲人。惟有人，始有事。不成人，何成事。故中國人於事，每主退不主進。如孔子，其爲魯哀公季孫氏所重視，苟能相與，和衷共濟，於魯國當時之政，必當有所成。但孔子之爲人則必將由此而有損，則其所成亦不能大。孔子退而去魯，遂完成孔子之爲人，而其影響及於後世，則有勝於堯舜文王周公之上者。亦可謂非知孔子，則無以知中國史。非知中國史，亦無以知孔子。其他歷史人物皆然，惟有其正反損益廣狹久暫之不同而已。讀西洋史，則當從其一事一論，不得從一人一人論。希臘羅馬迭興迭亡，此爲事。周公起，孔子繼生繼起，此爲人。人存政舉，人亡政熄。亦可謂，其人存其史舉，其人人亡其史熄。惟治中國史，乃能明其義。近代國人羣慕西方事，盡鄙中國人。不幸而世界第三次大戰續發，核子武器逞威，一部中國史，庶可獲我國人之重加反省，此誠無可奈何之事矣。

叁

一、

易繫辭言：「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是指已者也。」朱子註大學：「物，猶事也。」中國人每事物連言，物上必有事，事中必有物。如人生衣食住行，食則五穀百蔬，雞魚豬羊。如衣，蠶桑絲織，麻布棉裘。住則洞窟巢穴。行則車馬桴筏。豈不皆因物見事。即至近代，電燈電話電腦，凡屬科學發明皆然。此即易之所謂開物成務也。近代國人羣尊易爲一部哲學書，但易書中亦多言及科學。中國學術傳統，本無哲學科學之分。即易之一書而可見。

易繫辭又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神物連言，天地亦神亦物，亦以供民用。是西方宗教，以易書言，亦與哲學科學渾成一體。繫辭又言：「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屬宗教信仰，然如易言，則電燈電話電腦皆可謂之神，則科學豈不與宗教相通。繫辭又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並言，亦屬一體。形上形下爲兩端，而形爲之中心，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捨其形，又何以見形而上之道。故言事則必言物，言器則必言道。繼之言天則必言地，言德則必言業。形上形下，則必通而言之，以見其爲一體，則哲學科學豈不亦相通。近代國人乃以形而上三字譯西方之哲學。但如牛頓之萬有引力，此乃西方科學上一大發明，亦即形而上者。萬有乃其

形而下。萬有引力即由形而下見形而上。無此萬有，即不見此引力。故引力即屬天，屬神。自中國人觀念言，亦科學哲學宗教同可會通合一之一例。故在中國學術傳統中，無此三者之分門而別類。

近人又分自然與人文。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孔子只言人文，不及自然。論語又言：「子不語怪力亂神。」神亦為孔子所不言，是孔子亦不言及宗教信仰。莊周道家喜言自然。易之為書，則兼儒道以為言。莊周言：「薪盡火傳，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薪乃一物一器，屬形而下。火猶道，屬形而上。天地萬物，變化無窮。即在此無窮變化中見道。火只是一燃燒，一作用，一業。薪能為火，即薪之德性。則莊周此番話，亦可見其會通宗教哲學科學三者而言之矣。

繫辭又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以神知連言。但此神字，已非孔子所不語之神。今人慕效西方，競言知識。實則知識僅以藏往。往乃已然之物。即如電燈電話電腦，皆就已然物中發現其性能，而加以利用。則科學知識亦僅藏往而已。人類使用電燈電話電腦後，其所影響於人生者，則科學家亦不詳加計及。如核武器可以大量殺人，當前是否將有美蘇核武器大戰，則其事豈不亦為美蘇人所不知。果使有核武器大戰，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究竟孰存孰毀，抑兩者俱滅，豈不仍為全世界人類所不知。孔子曰：「如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是孔子乃易繫辭所謂知來之神矣。

易繫辭又言：「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方靜而圓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形象。著則運用數字之變以為占。數無定形，又易變，故著屬圓，卦屬方。中國人言天圓地方，然天地和合成為一體。著動卦靜，非有卦，則著亦無所用，故著與卦亦和合成一體。則神與知亦當和合成一體。非藏往之知，亦無以見知來之神。今亦可謂西方科學亦方以知，宗教則圓而神。苟以易道言，則宗教科學豈不仍可和合成為一體。而西方則此二者顯相分別，形成對立。

西方人重具體現實。故重於知，而忽於神。科學勿論，即其哲學亦重知，不言神。所謂經驗主義，固重藏往。即所謂理想主義，亦只在具體現實上提出一理想來求改造，而於其將來之演變，則仍所忽。故西方人重空間向外之擴大，不重時間向後之懸延。中國人言世界，世乃時間，界則空間，時空和合為一體。近代西方始有四度空間之說。即言宗教，上帝、天堂、靈魂，實皆言空間，並不涵時間義，亦即無變動義，只此一靜定之具體存在而已。故其宗教信仰，亦只是一種方以知，而非

中國人所謂之圖而神。

西方哲學，古代柏拉圖言理想國，乃就當時現實情況加進其一番理想之改革。但此理想國實現，則當永遠是此一理想國，再不能有變。近世如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亦就當前提出一理想。但此下亦永遠是一共產世界，再不能有變。可見西方人之哲學思想，實一靜定性，不涵時間性。一如宗教上之上帝天堂，永只如此。

中國孔孟莊老言道則必有變，但變中又必有常，有時間性之懸延，乃可聯貫會通而成為一傳統。中庸易傳則又會通儒道而更有變，但仍不失其傳統。易繫辭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天地萬物只是一化，於此一化中加以裁制，乃見為變。如人之自幼而老，同是一生命之化，加以裁制，乃見為幼年中年老年。而西方人則謂幼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過份重視其分別性，不再注意其聯貫性融通性共同性，則有變而無化。

故西方之宗教科學哲學，雖分別為三大項，但有一共同精神，即各顧當前，不計將來。凡其觀念苟有成立，皆求不變。如上帝天堂，永是此上帝天堂。如柏拉圖思想，則永是一套柏拉圖思想。倘有變，則如亞里斯多德所謂「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故亞里斯多德則另有一套思想，而不再是柏拉圖思想。當前科學發明如電腦機器人核子武器，各是一套。倘別有發明，則又是另一套。故西方科學哲學雖多變，實亦一如宗教，皆求其不變。換言之，即不存有時間觀。即如文學中之小說戲劇，藝術中之雕刻繪畫，亦莫不然。每一成立，即是一永恒，即是一無變。埃及金字塔可為代表。故西方人好言變，即因其不知變。西方人言變，則必是另一套，無中國人之所謂化。化則同一存在，而有時間性。變則在同一存在中各自相異，其相互間無合和無聯貫無時間性。故西方獨無史學。西方史學之起，乃近代事。因史學最富時間性，雖歷變而仍有其聯貫性，依然是一體。而西方人則缺此一觀念。中國史學之興起乃甚早，並最盛行。

易繫辭又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草木之文，與地之宜，近取之身，遠取之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之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耨，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之於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之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